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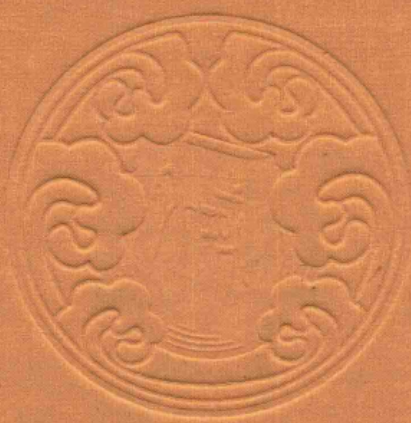
聖濟總錄

易珍版



(宋) 趙 佶 敕編
〔日〕 杉本良仲溫 等校刊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火版社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聚珍版

聖濟總錄

壹

(宋) 趙 佶 敕編

〔日〕 杉本良仲溫 等校刊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國家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重點出版工程項目

新聞出版總署列為「十一五」國家重大工程出版規劃項目

國家出版基金重點支持項目

謹向日本矢數醫院及茨城大學
真柳誠先生為本書出版所付出
的努力致以誠摯的謝意

據日本江戸醫學館聚珍本影印
原書半葉框高二十二點五釐米
寬十六釐米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主持編纂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主任：柳斌傑

副主任：紀寶成 陳祖武 黃蓉生

秘書長：黃書元 周安平 古風

顧問：白化文 安平秋 何茲全 林甘泉 李致忠 袁行霈 陳高華 馮其庸

傅璇琮 楊耐思 樓宇烈 魏同賢 饒宗頤（按姓氏筆劃排列）

編委：

卜憲群	王子今	王秋桂	王勇	王家興	王啓發	尹在碩	古風	白永瑞
白撞雨	任超	江金輝	沈乃文	沈津	沈衛榮	李民	李定凱	李遠毅
李富華	李憑	吳樹平	金慶浩	周心慧	周欣平	周斌	周興俊	
波波娃·伊麗娜·費德羅夫娜		南權熙	段志洪	姚伯岳	真柳誠	夏露		
徐維凡	翁連溪	孫家洲	孫欽善	陳士強	陳益源	陳慶浩	張玉範	張西平
張志清	黃仁生	黃樸民	黃燕生	喻遂生	楊成凱	楊恩芳	趙凱	蔣寅
鄭克孟	鄭金生	樓勁	黎小龍	潘少平	閻征	賴長揚	盧偉	嚴紹盪

(按姓氏筆劃排列)

漢籍之路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序言

中國歷史上的對外文化交流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絲綢之路，傳播中國的物質文化；一條是漢籍之路，傳播中國的精神文化。

絲綢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質文化交流的道路，這是舉世公認的。絲綢之路（silkroad）的概念，是十九世紀後期由德國學者提出的。各國研究者接受了這一概念，並習慣用它來解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但是，現在看來，這一概念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外文化交流不僅僅是物質互換，還有精神溝通。絲綢之路概念的緣起，是對東西方商貿交流的研宄，對精神文化的關注稍顯薄弱。其次，中外交流不完全是中國與西方的交流，也包括與東方其他各國的交流。儘管到了今天，絲綢之路的概念經過開拓，形成沙漠絲路、草原絲路、海上絲路三個部分，可是仍然無法包容中國與東亞、東南亞諸國交流的內容。再次，中外文化交流與經濟商貿交流的綫路，也不完全相同，在歷史時間上也有較大的差異。所有這些，便是我們提出漢籍之路（bookroad）的原因。

漢籍是中國精神文化的載體，漢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著漢籍傳播的軌跡，尋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應該是當代學者和出版人的責任。這些年，有志於此的學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學者就提出用書籍之路的概念，來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細想來，書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漢籍之路明確，探究的範圍也不應該局限在兩國之間，應該把漢籍之路作為打開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鑰匙。

漢籍之路的概念發萌於《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的編纂工作。在海外漢籍的版本調查、珍稀文獻的收集整理過程中，我們逐漸認識到漢籍文獻流傳海外的一些特點。一般來說，漢字文化是中國民族文化的結晶，浸潤了東亞與東南亞文化圈。在古代，漢籍的傳播是主動的、發散性的；傳播的途徑點面結合。在近代，漢籍的傳播是被動的、綫性的，珍

貴的文獻被不平等交易或戰爭掠奪到海外。毫無疑問，漢籍傳播的形式與道路，無法與傳統意義上的絲綢之路重合，而這方面的工作又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內容。這樣，突破絲綢之路的傳統思路，構建研究中國文化傳播與交流新的理論模式，也就成為必然要求。絲綢之路是一條商貿的道路，漢籍之路是一條文化的道路。區別這兩條道路，對於釐清我們概念的誤會，拓展研究的視野，將會有一定的意義。當然，這還有待於學術界的研究，有待於學者們的認同，有待於我們更多的共識。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是國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項目，寫入《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綱要》之中。域外漢籍珍本是指國外圖書館、研究機構和個人收藏的、國內不見或少見的漢文古籍文獻，內容有三：其一指我國歷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漢文著述；其二指域外翻刻、整理、注釋的漢文著作（如和刻本、高麗刻本、安南刻本等）；其三指原採用漢字的國家與地區學人用漢文撰寫的、與漢文化有關的著述。這些文獻內容豐富，涉及中國經學、史學、佛學、道學、民間宗教、通關檔案、傳記、文學、政制、雜記等各個方面，彌足珍貴，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料，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資料，同時是研究歷史上東亞漢語言文化圈的基本資料，是中華文化的珍貴遺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了「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對「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性。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政府與民間有多個斥重金回購流失文物的舉措，但是對佚散海外的漢文古籍的回購、複製、整理工作重視並不夠。域外漢籍珍本是中華文化的寶貴財富，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計劃出版一套影印古籍，共計八百本，囊括兩千餘種珍稀典籍，應該是當代中國最輝煌的出版工程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流失國外珍稀文獻的搜尋整理，不是一項簡單的文化活動，更主要的目的是通過這項活動，妥善保存中華文化遺產，豐富中華文化內涵，熔鑄中華文化精神，從而強化中華民族的尊嚴，提升國家的形象。同時，佚散在海外的漢籍文獻，由於各個國家重視程度的不同、保護手段的差異，文獻的品相也各有不同，因此，儘快地刊印無法再生的域外漢籍珍本，應該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出版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交往日益頻繁，與許許多多國家互結友好，以漢字為特質的中華文化也得到世界各國文化

學術界的重視，整理域外漢籍不僅是國內學者的呼籲，也是國外學者的倡議。在這種良好的條件下，我們經過反復論證，決定在學界鼎力襄助下，編纂出版《域外漢籍珍本文庫》，以留下前人超越時空的智慧和豐富多彩的文化典籍。

毋庸諱言，《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的編纂，也將給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積累豐富的學術資料，給漢籍之路的理論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內涵，流失在海外的漢文古籍便是「漢籍之路」閃亮的標識。我國的出版工作者應該弘揚漢籍之路理論，推動漢籍收集出版工作，使中華文化的價值進一步得到世界的認同。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資料搜集與編纂已進行多年，版本調查、編目、複製、出版等各項工作進展有序。作為成果的《文庫》將由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自今年始，本叢書將陸續與學者、讀者見面，特應編者與出版者之邀而為序，茲綴數語，以表心志。

戊子仲秋

柳詒志

《聚珍版聖濟總錄》影印說明

《聖濟總錄》為趙佶（即宋徽宗）敕纂，編於北宋末政和間（一一一——一一一七），兩百卷。該書以各科醫方為主體（收方兩萬餘首），兼收醫理及針灸等內容，堪稱北宋醫學集大成之作。今存該書最早刊本為元代大德間重刊本（以下簡稱「大德本」），然僅殘存九十一卷，分散收藏於中、日六個圖書館。該書現存以大德本為底本的最完整古刊本，祇有日本江戶醫學館的木活字聚珍本（以下簡稱「聚珍本」）。因此，本次影印即選取聚珍本為底本，使之再度完璧面世。以下對《聖濟總錄》的學術內容及主要版本作一簡介，並重點介紹本次影印底本的有關情況。

一、別具一格的北宋醫學集大成之作

古代醫書流傳史上，曾經問世的衆多醫書很大一部分湮沒散佚，北宋以前手抄醫書散佚尤其嚴重。所幸若干大型醫書還流傳至今，這些醫書保存了非常豐富的早期醫藥內容。此類醫書屈指可數，舉其要者有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唐代孫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外臺秘要》等書。北宋是醫書由手抄向版刻過渡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的一頭一尾有兩大官修醫書——《太平聖惠方》和《聖濟總錄》問世，它們分別反映了不同時期的醫學成果。

《太平聖惠方》產生於北宋之初，即淳化三年（九九二），主要彙集的是唐、五代的醫學資料。北宋時期，醫書刊行與醫學教育有了長足的發展。這一百多年醫學高速發展，催生了《聖濟總錄》。雖然這兩部大書都以醫方為主體，編纂體例也有若干相似之處，但其內容却各具特色，宛如雙璧，交相輝映。

整個北宋時期，幾乎每一代君王都有促進醫學發展的舉措。宋徽宗趙佶更是與衆不同，他不滿足於金殿聽奏下旨，還親自插手醫書編纂。政和間以宋徽宗御纂名義編纂的書有《聖濟經》與《聖濟總錄》。今存《聖濟總錄》無任何參編人員署名，但實際上應該有很多御用醫官參與其事。證據是《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的八名校勘官，全都參與了「編類《聖濟經》」

(如圖一)。《聖濟經》是本小書，但最少已有八名醫官參與。這批人員也同樣參與校勘《政和本草》。據此，同在政和年間編成的巨著《聖濟總錄》，也應該有大批醫官投入其中。宋徽宗介紹《聖濟總錄》的編纂時提到：「亦詔天下，以方術來上，並御府所藏頒之，為《補遺》一卷，《治法》一卷。卷凡二百，方幾二萬。」可見《聖濟總錄》是利用國家力量組織編纂的大型醫書，在取用資料及編纂人才方面具有莫大的優勢，這是該書能集北宋醫學之大成的根本保證。

歷代以醫方為主的大型醫書，大多屬於類書性質，重在資料彙集，很少能反映編纂者們的學術思想與見解。《太平聖惠方》是此類醫書的代表作之一。但《聖濟總錄》與之又有不同：它雖然也以醫方為主體，却不能視為單純資料類纂之書。這是因為該書中插入了許多編纂者的醫學見解，從而能反映北宋醫學學術的某些新進展。

從編纂體例來看，《聖濟總錄》繼承了《太平聖惠方》的傳統：「逐病分門，門各有方；據經立論，論皆有統。」即把眾多的醫方，用病證來分門別類。每門病證之前，先出一篇正統的醫論。《聖濟總錄》兩百卷，有一百八十卷是按病分門，共計六十一門。其病證涉及風病、傷寒、溫瘧、雜病，及九竅諸科、婦人、小兒等，堪稱集北宋醫學之大成。但《聖濟總錄》在同一體例下，又有不同於《太平聖惠方》的創新之舉。

《太平聖惠方》諸病之論，基本上是直接摘取隋代《諸病源候論》的論說，而《聖濟總錄》則不然，各門病證的論說基本上屬於新撰。這一變革的好處是能反映北宋時對疾病的最新認識，同時又有利於將該病的理法方藥融為一體，使之更貼近臨床。

此外，《太平聖惠方》所收之方，以唐中後期及五代時的民間藥方為主，甚多小方、單方、無名方。《太平聖惠方》成書之時，正值宋初。唐末五代國家分裂，藥材交流受阻的影響仍然存在，所以該書中的服藥方法以「煮散」為主，便於節約藥材。《聖濟總錄》則不然，其成書已值北宋末，藥材生產極大豐富，辨證用藥風氣日益濃厚，北宋的用藥劑型多依據疾病性質而定，以湯劑為多，並不拘泥於節約藥材。該書收方不論大小，重在實用，故多採前人醫書實用之方，其中藥物炮製法及劑型更為豐富。日本學者櫻井謙介先生曾綜述上述二書劑型運用的差異，^{〔一〕}指出《太平聖惠方》以散劑為多，而《聖濟總錄》則轉而以湯劑為主。因此，《聖濟總錄》堪稱北宋醫學發展的代表作。

結合具體疾病來比較二書，更容易看出《聖濟總錄》的上述特色。以「黃疸」病為例：

《太平聖惠方》卷五十五以「黃病」為總名，內含黃疸、三十六黃及其他十三種發黃疾病。其分門及論說均沿襲《諸病源候論》卷十二「黃病諸候」，並全文採用了唐代的《治三十六種黃證候點烙論並方》。這是非常典型的類書編纂法，重在採集前人資料，並不表達編者的見解。

《聖濟總錄》相關內容則被歸入「黃病門」（卷六十、六十一），其下子病十種，「三十六黃」被作為專門的一類黃疸病。但無論是該門的「黃疸統論」，還是子病的分論，其病證論說皆屬新撰。該書提出「疸病正有五種」，也就是黃疸病通常有五種正疸，而「九疸、三十六黃，其證其名，悉各不同，治皆有法」。也就是說在正疸之外，還有一些另類的黃疸病，其證候、治法均另有方法。對同名的「三十六黃」，《聖濟總錄》的論說也完全不同於《太平聖惠方》所錄。該論指出：「黃病有三十六種，所載名數雖同，而證候各異，皆非黃疸之比，求之於經，無所稽考，然此病中原之人未曾識，惟東南方往往有之，其狀與熱病相似，俚俗能辨之。」可見這是一種地區性的、多屬「濕熱相蒸」而致的新病。從現代眼光看來，這類黃疸很類似鉤端螺旋體病引起的發黃，與一般雜病黃疸截然不同。由此可知，《聖濟總錄》雖然也「逐病分門，門各有方」，但其立論却是立足於北宋醫學對疾病的認識，而非一味摘抄前代經典醫著的現成之說。

在北宋一百多年中產生的兩部巨著，雖然體例大致相同，但無論諸病論說，還是所收方劑，都很少重複。櫻井謙介曾統計了「骨蒸、傳屍」類的方劑，其中《太平聖惠方》有方一百一十首，《聖濟總錄》有方一百首，兩書相同之方祇有一首，即便類似的方也不過三首，可見《聖濟總錄》編纂者非常注意避免與《太平聖惠方》收方重複。

在病證分門之外，《聖濟總錄》用了二十卷的篇幅介紹其他醫學內容。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關於治則與療法的內容。這一塊內容在此前的大型醫方書中是一個薄弱環節。但自從《素問》在宋代刊行以後，尤其是其中的「至真要大論」提到很多治療原則和方法，給後世醫家很大的啟發。也許是受此影響，《聖濟總錄》不僅在卷四專設「治法」一章，而且在書後設「補益門」、「食治門」（各三卷），說明已經比較重視某些治療方法。必須指出的是，該書的「治法」實際上包括了當今所說的「治則」與「療法」兩類不同的概念。所以該書卷四既有「平治、本標、逆從、奇偶、輕重、補益」等治

則、組方等內容，也有「漬浴、祝由、熨引、按摩、導引、灸、刺、砭石」等藥療之外的各種治療方法。為此，該書在最後設的「針灸門」（四卷），即屬於非藥物療法，可見《聖濟總錄》絕非純粹醫方書。

宋徽宗癡迷道教，號稱道君皇帝。囿於其個人癖好，《聖濟總錄》也收錄了運氣學說（兩卷）、「符禁門」、「神仙服餌門」（各三卷），這些內容占八卷之多。但總體來說，《聖濟總錄》所記載的醫學知識，仍是以臨證治療為主。其收方的宏富與編纂者精心撰寫的病證論說，至今仍對中醫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完整展現原貌之最佳印本

據《聖濟總錄》趙佶御製序，《聖濟總錄》初名《政和聖濟總錄》，故該書主要編纂於政和年間。多達兩百卷的巨著，雕版並非易事。故書成以後，並沒有像《聖濟經》那樣於政和八年（一一一八）及時頒行天下。靖康二年（一一二七），汴梁城破，宋徽宗被金兵擄到北地。宋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五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被擄書籍中據信包括了《政和聖濟總錄》與《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兩部大書。

流傳金地的《聖濟總錄》究竟是已完書稿還是雕成版本，史料無明確記載。最早談及該書身世的是元代焦養直《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序，云「惜其初成於政和，重刊於大定」。據此，金大定間（一一六一—一一八九）該書已有刊本問世。在此以前，即便存在宋刻版本，也未見記載曾予刊行。至於大定刊本是用擄至金國的版本重印，還是再次雕版重刊，因書已無存，學界衆說，皆屬推測，莫衷一是。

大德本：今存世最早的《聖濟總錄》是元大德四年（一二三〇）刊行的《大德重校聖濟總錄》，此時距金大定刊本已歷百餘年。焦養直序稱，當時朝廷「乃詔江浙行省刊於有司，布之天下。其或謬戾，雖加釐正，復降德音」。這就是後世所稱「大德本」。該本每半版八行，每行十七字，字大疏朗，大類宋版（如圖二）。據日本犬卷太一君最新的研究，（三）目前存世的大德本共有一百一十二卷。其中日本宮內廳藏三十五卷，杏雨書屋藏三種共二十一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四種共二十九卷，中國醫科大學藏十卷，中國中醫科學院藏二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六卷。除去重複卷次，大德本《聖濟

總錄》實際存世尚有九十一卷。

中國明清之時，已無大德全本存世。但日本在江戶時期，尚存有大德全本，這就是吉田宗桂家藏之本。此外，日本丹波氏也有家藏該本的零本及古寫本。據丹波元簡《醫賸》記載，他所見的大德重校本，「大版大字，書法端雅，蓋為宋版之舊。但每卷首頁『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卷第某』數字，書刻並劣，係於元人改刊無疑矣」。

我國前輩學者范行準在其著作《棲芬室架書目錄》中根據以上記載，斷言此大德本就是宋內府刊的原版。元兵滅金時獲得此版，「至大德中印刷此書時，將每卷第一行書名上挖去幾個什麼字，而鑱入『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卷第』十個字，遂以為元大德重刊本」。正因為有此一說，所以當今日本有影印的《宋刻大德本聖濟總錄》^{〔三〕}，就是因為其中收錄了四十一卷大德本而冠以「宋刻」之名，當然這尚不及今存世大德殘本的一半。考察現存大德本殘卷，其卷首題字的書刻似乎並不很拙劣。如果大德本祇是直接將宋版挖改卷首書名，按理無須從北方把宋版搬到浙江去剗改。大德本確實可能仿宋版或金版刻成，但說大德本就是宋版元印，還有待更新更可靠的史料來證實。不過毫無疑問的是，目前學界一致認為大德本是《聖濟總錄》今存唯一的最早刊本。可惜該本存世者不足原書一半，無法反映該書全貌。

汪刊本：自大德本刊行以後，整個明代未見重刊，明代書志甚至極少提到此書，因此醫家多不知有此書存世。直到大德本刊行近五百年後的清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才有汪鳴珂燕遠堂重刊本（一七八五—一七八九）問世。汪氏為搜集散佚的《聖濟總錄》所作的努力，可謂艱苦卓絕。但雖經東拼西湊，汪氏最終還是未能收齊該書全帙^{〔四〕}。當然，此本使《聖濟總錄》重見天日，為世人矚目，但若論此版本，却遠非佳本。後世藏書家指出該本乃「補湊」而成，且「文字頗有刪竄，其篇章亦多私改。如小兒門，填以後世方論」。^{〔五〕}此本存世者有二十多部，但因其底本不全，編校不得法，故不為後世所重。

日本聚珍本：與汪刊本問世僅隔二十四年，東鄰日本江戶醫學館以大德本為底本，採用木活字出版了全本《聖濟總錄》（如圖三）。該本學術及版本價值可用「全、真、精」三字予以概括。

所謂「全」，是指該書所用底本是非常完整的大德本，無須補綴、拼湊。「真」則指此大德底本的來源確鑿可靠。聚

珍本所用的大德本，屬吉田宗桂家藏。該本來源清晰：「此本吉田宗桂人明時所贖歸，其家譜稱，天文八年（一五三九）與遣明使僧策彥同往，留學五年，治驗甚多。至十六年（一五四七）再往，適世宗有疾，宗桂措劑，不日亟愈。帝喜，賞以書畫珍玩，此其一也。」〔六〕該書為吉田氏家族「世世珍藏，不啻拱璧」〔七〕。

日本江戶時期是彼邦漢方醫學發展的鼎盛時期。至江戶後期，日本醫學考證學派興起。該學派以江戶醫學館為基地，以丹波元簡、丹波元胤、元堅父子為中堅，在醫學文獻的搜集複抄、考證注釋、校勘出版等許多方面建功立業。如此高水準的一批漢醫文獻專家，當然深知吉田氏所藏《聖濟總錄》的價值。他們認為此書能流傳到日本，「如有神物呵護，可謂醫門一大幸矣」。為防「祝融陽侯之厄」，文化十年（一八一三），江戶醫學館由山本錫侯、丹波紹翁出面，從吉田氏十世孫那裏借來大德原本，然後又利用丹波氏家藏本及古寫本作為校本，費時四年（一八一三—一八一六），予以校讎，採用活字印刷了該書兩百部。這就是現存的聚珍本，也是古代繼大德本之後唯一的《聖濟總錄》全本。目前存世的聚珍本以後的各種抄本及印本，沒有任何一種能確切展示其底本是大德全本的依據。祇有聚珍本的底本既「全」且「真」。

所謂「精」，是指聚珍本不僅底本全、真，而且經江戶醫學館衆多高手校勘之後，成為足以傲世的精品。聚珍本中記載了三十九位原參與刊刻人員的姓名，這些人員都是「醫官暨其子弟肄業於醫學者」，決非一般書坊校勘人員可比。其中督刊者為當時日本國家級醫官杉本良、山本瑞、千田恭、曲直瀨正隆、丹波元胤等七人，可見當時日本醫藥界對此書校勘印刷之重視。擔任校勘與校對的大多是各級醫官，這就決定了該本具有校勘精良的特點。

聚珍本採用木活字而非影刻，可能是為了方便體現校勘成果，也可能是因為大德本字大行稀，每半葉最多不過一百三十六字，而聚珍版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最多可容納二百一十字。改版的結果是可以降低工本，使原書龐大的體積得以適當縮小。該書的印刷刊行，使《聖濟總錄》繼大德本之後又有了一個極為精良的刊本。這也是本次影印選定該本的根本原因。

在聚珍本刊行之後，中國在民國間出版了上海文瑞樓石印本（一九一九）。該本也是全本，一般認為是以日本聚珍本為底本的翻印本，其文獻價值自然無法與聚珍本原本相比。